

行政介入,知识界连学术会议都不知道开了。这也许还只是问题的表象,更深层的问题是,人们对这样的现象麻木了,政治面和知识面都沿以为例。长此以往,知识面就会失去对社会危机的嗅觉,更发挥不了对政治面的警示和规训功能。

知识面探索什么、形成什么结论应该与政治采取什么行动区分开来。知识面可以就政治面提出的问题展开研究,也可以根据其自身的材料和逻辑形成各种各样的结论,但政府是否选择这些结论或建议是政府的自由。一个根据科学规律下结论,一个根据公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选择,求同存异。这样,政治面就没有必要害怕知识面有“踩线”之嫌,知识面也没有必要受仰政府鼻息之累。知识面的意见并不必然要转化为政治行动,因为两者各有其运作的规则。比如,从知识面看,我国早就掌握了发展航母的技术,但政治面考虑的是发展与不发展航母、何时发展航母对国计民生更为有利。所以,我国发展航母的计划至今仍未明晰出炉。

知识面应该加强自律,忠实其使命和职责,避免知识面完全官学化。在处理知识与政治的关系上形成一定的沟通机制和管道是必要的,也可以有一批官学两栖的官员和学者。政府中要有通学术、熟悉学术规则,与学术界广交朋友的学者型官员;学术界也要有通政治、熟悉政治规则,与政治面广交朋友的官员式学者。这样对政治与知识的互通是有益的,但是,学者型官员可以多,官员型学者却不能成群成风。因为,学者型官员可以借助其丰富的知识储备更好地执政,而官员型学者却不能借助其政治地位真正做好学问。现实的情况是,学者型官员不够多,而想与官方搭上关系的

学者却很有市场。这说明在知识与政治的关系机制上,政治面介入知识面的程度比知识面影响政治面的程度深得多。在这样的体制下,知识面会越来越浮躁,安心耕“责任田”的人少了,谋一官半职的人多了,知识积累和学术研究不滑坡才怪呢。比如在高校,以往需要作深度的动员才能请出教授来做行政,当校长、系主任,现在想谋位的人多了,不得不搞竞聘。在学术界里也滋长了论官排位的官僚风气,诸如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评估专家委员会。如果你只有学术头衔而没有行政职务是很难成为其中一员的,即便你侥幸挤进去了,话语权也是掌握在带长字号的专家手中。这并非因为你的学问不如他,而是因为你没有官员身份。在知识大殿里,不以知识学问的深厚为尊,而以行政职务的高低为荣,是知识政治化的苦果,而非政治知识化的琼浆。我们需要推动的是政治的知识化,而非知识的政治化。这应该成为处理政治与知识关系的基本原则。

参考文献:

- [1] 欧克肖特. 政治中的理性主义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 [2] 韦伯. 学术与政治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3] 劳斯约. 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4] FOUCAULT M. Power/Knowledge [M]. New York Pantheon 1980 98
- [5] 孙关宏, 胡雨春, 任军锋. 政治学概论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103.

[责任编辑:冯昱锦]

## 市民社会的成长是政治知识化的社会基础

何 历 宇

(浙江财经学院 人文艺术学院, 杭州 310018)

**摘 要:**以政治理性化为核心的政治知识化是现代政治的重要特征之一。人民主权观念是政治知识化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而孵化人民主权观念并使其得以转化为现实的政治生活的社会基础则是现代市民社会的兴起。

政治知识化,指的是现代政治的知识建构性

与知识积累性,其核心是政治理性化。政治知识化最深刻的原因源于整个现代性之中。现代社会形态替代传统社会形态,以及近代科学改变人类知识形态为现代政治知识化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及其社会基础,这一基础的载体就是市民社会。

收稿日期: 2007-09-26

作者简介: 何历宇(1971-),男(苗族),贵州思南人,副教授,法学博士,从事政治学与公共伦理研究。

## 一、人民主权观念是政治知识化的思想基础

政治领域成为客观透明的认知对象是政治知识化的前提条件。从最直接的思维机制上说,这种对象化是与现代民主政治的主权观念联系在一起。现代主权观念把主权与治权区分开来,从而为探讨政治形态的运行规律提供了可能,也为治权的制度化提供了条件。

第一,人民主权观念破除了政治权力的神秘性,为政治现象的客观研究提供了认识前提。人民主权观念使人类对国家的思考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开始从人的眼光看待国家,重新寻找以人为中心的制度安排。政治权力来自人而不是神的观念,把权力从天上搬到了人间,为现代政治的透明化、制度化提供了文化基础。寻找好的国家形式曾是古希腊民主制度和政治知识得以繁荣的重要动力,政体研究是古希腊政治学的核心内容,如果没有民主价值的确立,这种研究就是多余的。

第二,人民主权观念开辟了现代公共批评的文化空间,成为政治知识繁荣发展的重要条件。国家最高政治权力不再属于任何个人而是为全体人民所共享,这为公众对政治的批评提供了道德文化基础。政治权力既然为大家所共有,自然可以为大家所研究和讨论,成为客观的认知对象。这种批评为政治知识的积累提供了现实的途径。

第三,人民主权观念一劳永逸地确立了权力的归属,把权力的运作过程和使用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为现代政治的制度化提供了契机。为了体现人民的主权,就必须建立一套制度,以综合人民的意见;建立权力的行使者与人民沟通的渠道,形成人民对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以实现人民的利益等等。在政治权力的运作和对权力运行的监督过程中,政治知识和技能就会倍增。

第四,人民主权观念分离主权与治权的思想使现代公共管理独立出来,并且促进了公共政策研究的繁荣。现代公共管理从政治领域独立出来,摆脱了各种价值分歧的纠缠,得以客观地总结和自身的研究经验和内在规律,产生了现代行政学,构成了现代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公共管理不同于传统私人行政的地方是它与现代主权观念的联系。按照这种联系,公共管理的目的是为了服务大众社会的需要。为了满足大众社会复杂、众多的需要,就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并且日益复杂的公共政策。在现代社会,公共政策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现代政治知识体系的发展,并且日益成为现代政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市民社会是推进政治知识化的基本建制

市民社会的发育对现代政治形态产生的深刻

影响之一就是它充当了孵化人民主权观念的温床,并使其得以转化为现实的政治生活。随着市民社会的成长和壮大,政治活动的主体由上层精英走向大众社会,实现了政治的社会化和知识化。

从社会经济根源来说,现代主权观念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社会实现自身的政治利益需要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就是政治上的民主。现代政治民主在社会结构上的最为重要的表现之一是国家与社会(或政治与经济)的相对分离,正是这一分离促进了现代政治知识化的发展。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分离意味着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代理机制。代理是有风险的,为了降低或避免风险就必须对代理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绝大多数民众无暇直接参与政治管理,他们要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体现作为主权者的地位,就不得不寻求政治上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市民社会虽然也有共同的利益,但这种共同的利益仅仅作为维护其再生产的条件而存在,是抽象的。作为群体,市民社会本身则完全处于一种竞争状态之中,它们感受到的更多是利益的冲突而不是利益的一致;暴露的更多的是人性恶的一面而不是人性善的一面。因此,现代民主政治必然不同于传统封建君主的人治的地方在于,它必须重视法律和制度在政治领域的主导地位。怎样设计一个符合民众根本利益的制度,怎样为政治权力的运作立法,就成为现代社会民众集中关注的目标。这种朝野各方的政治需要形成了政治知识化的基本动力。但是要将政治知识化坐实下来,则有赖于市民社会及其机制的发育。

第一,市民社会对现代政治的影响所产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使得政治领域的知识主体摆脱了狭隘的阶级限制,其力量越来越强大,这是人民主权观念得以巩固和发展的现实基础。

在传统社会,政治知识创新、积累和传播受到阻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掌握知识的主体受到限制。应该说,即使在一个专制社会,也有不少社会精英在思考政治形态发展的规律,他们也掌握不少反映客观政治现象的政治知识。另外,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也需要积累治理社会的政治经验,制定出一些符合统治需要的稳定的制度和法律。但是,对于社会精英来说,由于大量政治领域的信息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很难得到客观研究所需要的足够文献材料;由于政治参与的途径非常狭窄,第一手的实践经验很难获得;加之政治知识传播机制受到严格限制,因而知识主体处于零散、分割的状态,不能为有效的知识积累提供主体基础。一般情况下,制度的真实功能和运作机制即

使在统治者内部往往也是不允许充分讨论的。这样,政治领域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实际上就成为一个神秘王国,知识的创新和积累都是很难的。没有知识上的进步是专制社会无法走出“克隆政治”循环的重要原因之一。与传统精英政治不同,现代市民社会承担着非常重要的文化功能,成为政治知识创新、积累和传播的基础。

对此,哈贝马斯、柯亨和阿拉托都曾认为市民社会是一个既独立于政治体系又独立于经济体系的纯粹社会文化体系。市民社会的正当职能是培育公民文化,而不是直接介入权力运作。在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人民主权仅仅体现在交往权力中。如果人民欲直接行使管理权,权力就会处于真空状态,从而为专制或无政府状态的出现提供契机,从根本上破坏民主政治。

现代市民社会作为文化公共领域的核心,不仅在于知识的创新、积累和传播是其基本功能,还在于它为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生长和发展提供了活动空间。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曾系统地分析过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与近代政治科学产生的关系。他认为,正是发端于中世纪晚期的市民社会经济力量的迅速成长最终导致中世纪宗教统治的结束,才最终打破了政治资源对知识的垄断,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正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产生,才使得政治科学第一次成为可能<sup>[1]</sup>。曼海姆指出,知识分子能够形成一种相对独立力量的关键机制是市民社会的成长打破了政治权力对社会资源的垄断。由于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相对分离,每一种资源的地位和力量都取决于其他两种资源的关系。对于生产文化资源的知识分子来说,如果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是不可分的,或者出现政治资源完全控制经济资源以及经济资源完全控制政治资源的情况,知识分子的地位就是没有保障的。只有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处于某种相互制约和力量平衡的状态,知识分子才可能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力量发挥作用。如果没有知识主体力量的壮大及其在政治领域中的重要作用,人民主权观念也是很难想象的。

第二,市民社会参与政治活动的基本途径和方式促进了政治知识化的发展,正是在这些政治实践领域,性恶论成为一种重要的理论资源。

市民社会参与政治活动的基本途径和方式主要有议会、政党、选举等,这些方式都在促进着政

治知识化的发展,并且往往假定了人性恶的合理性。现代议会是随着现代政治重心向社会层面转移逐步发展和成熟起来的,现代议会普遍被看成是反映民意以及表达民众利益的政治机构。议会在政治知识化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规范整个政府的权力运作过程中成为现代政治、法律和制度的不断供给者,为政治知识的积累提供了动力。这主要是通过其立法功能来实现的。另一个作用是在监督政府和表达公众意见的过程中推动了政治知识的传播。18世纪的美国思想家潘恩曾指出:“代议制把大量关于政府问题的知识普及全国,从而扫除了愚昧,杜绝了欺骗。在此基础上无法施展宫廷的鬼蜮伎俩。这里没有秘密,也无法产生秘密。”<sup>[2]</sup>无论是规范还是监督政府,其潜在的理论假定都是对政府的某种不信任。

政党的产生是现代政治社会化与竞选制度不断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代议制发展的必然产物。政党作为阶级社会中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和团体的利益、愿望和要求的政治组织,在聚合本阶级的政治意识、表达本阶级的利益要求、夺取或维护政权的过程中,必须提出比较明确的政治思想、价值主张和行动纲领,这是政党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和依据。同时,由于代议民主制的关键在于影响和控制广大中下层选民,因而现代政党的行动目标就不再是小范围内的争权夺利;其活动的主要方式也不再是上层的秘密斗争,而是全方位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向全社会宣传本党的政治纲领。因此可以说,现代政党是政治理论的生产者,是政治知识的普及者和实施者。美国政治学繁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全国性的竞争性选举制度,美国政治学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直接或间接与选举有关的。在异常激烈的政党竞争中,政治家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尽管每一位政治家都宣称代表人民的利益,但是人们仍然不能不对政治家的动机持怀疑的眼光。

参考文献:

- [1] 曼海姆 卡.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13.
- [2] 潘恩 托. 潘恩选集[M]. 马清槐,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249. [责任编辑:冯昱锦]